

为何被视为“通天神器”，为何是中国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共同载体

## 神秘南方千年铜鼓再“敲响”

本报记者董振国、黄耀臻

“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给我们安舒。”广西壮族至今传唱着这首世代流传的铜鼓歌。

在广西，每逢重要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壮族、瑶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都要敲响铜鼓。

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史学界有“北鼎南鼓”之说。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蒋廷瑜介绍，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铜鼓与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

“铜鼓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目前所知，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9个国家都曾铸造或使用过铜鼓，有的国家、有些民族至今还在使用铜鼓。”蒋廷瑜说。

东南亚铜鼓文化历史悠久，铜鼓上的太阳纹、鸟纹、羽人纹等主要纹饰与中国南方铜鼓的纹饰十分相似或相同，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很早就已经有了交流和往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拥有铜鼓往往是权势的象征。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铜鼓文化再度兴盛。在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很多人家开始购买铜鼓摆放在家中，遇有重大节日、喜庆家事，纷纷敲响铜鼓；作为一种民族乐器，铜鼓也开始进入校园，陶冶学生的艺术素养。

### 中国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共同载体

缅甸铜鼓历史悠久。唐朝刘恂的《岭表录异》中记载：“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

骠国是古代缅甸骠人所建。史料记载，公元802年，骠国王派遣王子率使团访问中国，在长安用铜鼓献乐。著名诗人白居易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骠国乐》：“玉螺一吹稚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

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铜鼓国。越南清化省东山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鼓，被专家认为是越南最早的铜鼓。14世纪，越南汉字手抄本《越南灵异集》《岭南摭怪》等书中，就曾出现与铜鼓有关的神话传说。

14世纪泰国古老著作《三界经》也提到铜鼓：“锣鼓宣天，法螺号响，金钟丁当，铜鼓冬冬。”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波隆摩·戴隆洛迦纳纳尔的《宫廷法》又一次提到铜鼓，把铜鼓作为宫廷乐器之一。

东盟十国中，除了菲律宾外，其他9个国家都有铜鼓。中国的铜鼓和流传于东南亚国家的铜鼓，在造型、式样、纹饰等特征上，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1979年，日本学者今村启尔在《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上发表《关于Ⅰ型铜鼓》一文，提出了“先黑格罗Ⅰ型铜鼓”的命题，这类铜鼓就是中国学者分类为最早铜鼓的“万家坝型铜鼓”，在越南和泰国都有发现。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早期东山铜鼓就是在中国万家坝铜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年已八旬的蒋廷瑜是广西兴安县人，从事铜鼓研究30余年。他曾先后几次赴越南考察，通过对比铜鼓的造型、纹饰，发现东山铜鼓与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冷水冲型铜鼓相似：“越南早期的东山铜鼓受到了万家坝铜鼓的影响，与中国的石寨山型铜鼓并行发展，同中有异。晚期越南的东山铜鼓则反过来影响了中国铜鼓的发展，创造了新型的冷水冲型铜鼓。这种早期文明交流互相促进，让铜鼓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

国内外学者对铜鼓有不同的分类，但无论是越南的黄下鼓、广昌鼓、河内鼓，老挝的乌汶鼓，柬埔寨的马德望鼓、托斯塔鼓，缅甸的巴栖鼓，还是泰国的知府鼓，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铜鼓都与中国某个时期某一类型的铜鼓相似。

近年来，中国—东盟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经贸和人文往来不断加深。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东盟国家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相通性，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的长足发展、加深经贸文化往来，提供了文化相似、民心相通的基础。而铜鼓文化很好地印证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借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 通天神物的传说与图腾崇拜

越南的神话传说中提到，古代一位首领出征打仗时，夜梦山神，请求携带铜鼓随军助战，最后在铜鼓声助威下，取得了胜利。

壮族始祖称布洛陀。壮语中，“布洛陀”意为“山里的老人”或“无事不知晓的老人”。在壮族先民的口头文学中，布洛陀是创世神和道德神。传说布洛陀有开天地、定万物、取火、开红河、造谷物、造牛、教养家禽、造屋、射太阳的功绩。



▲红水河流域发现的一只铜鼓，鼓面虽被磨损，字迹仍清晰可见，已经历20代人传承，现藏在广西东兰铜鼓民间收藏馆。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铜鼓也是布洛陀造的。布洛陀开了天和地，造了人后，就在天上安了家，但有时他会从天上飞下来，倾听人间心声，看看人间缺少什么，再由他来创造。

有一次，地上的人们说：“大地上样样都好，就是缺少星星。”布洛陀说：“对呀，地上应该有自己的星星。”于是布洛陀带领人们用三色泥做模，采来孔雀石，砍来青铜柴，烧石炼铜。三天三夜后，炼造出了两端大中间小，一端封顶一端空的物件。封顶的一端有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周围还有一些小星星。

布洛陀用拳头照着大星星一敲，发出了“抛曼抛奔”的声音。布洛陀对人们说：“这些东西叫阿冉，它们就是地上的星星。”

壮语的“阿冉”即铜鼓，而“抛曼抛奔”就是壮语“保寨保村”的谐音。传说自此以后，壮族就有了铜鼓，铜鼓歌也在壮族中世代流传。

瑶族传说中，铜鼓是始祖密洛陀派他的儿子制造的。布依族传说中，铜鼓是祖先布杰为了让布依族的老人死后能上十二层天成仙，牺牲自己从天神那里讨来的。广西那坡的彝族传说，铜鼓是他们的祖先波罗和罗里芬铸造的，每逢农历四月初十彝族的跳弓节，节日里唱的诗经《铜鼓王》叙述了这对夫妇铸造铜鼓的经历。

“各少数民族都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器，他们认为铜鼓声可以沟通天上的神。”蒋廷瑜说，在一些用铜鼓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族人不能敲打铜鼓，甚至不能触摸，否则会被视为对神的不敬。铜鼓是神物，也常用来镇宅安居，或作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神器。

在广西红水河两岸的东兰、巴马、天峨、南丹等地的壮族村寨中，每年大年初一到二月初二前后，都要举行“青蛙节”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青蛙节”在当地又叫“蚂拐节”，敲打铜鼓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冷水冲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北流型铜鼓和西盟型铜鼓，基本都有青蛙或牛马立体装饰物伏在鼓面上。在冷水冲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遵义型铜鼓虽然没有青蛙，仍在纹饰上保有青蛙爪的痕迹。在壮族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女，是沟通人间与雷神的使者。“青蛙节”上跳青蛙舞、唱青蛙歌时敲响铜鼓就是要告诉天上的雷神，人们在祭祀青蛙，也在表达对雷神的尊敬。

在使用西盟型铜鼓的云南西盟佤族地区，传说铜鼓是由高山中修炼成精的一对青蛙夫妇所生的子女所造。铜鼓上铸上青蛙，是为了纪念已经修成人形的青蛙祖先。铜鼓上除了青蛙、牛马等立体装饰物，还有些云雷纹装饰，反映了少数民族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物，希望通过敲打铜鼓祈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稻作丰收，铜鼓也因此成为红水河两岸稻作民族崇拜的图腾。

充满着神话传说的铜鼓，真正的发源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从起源地进行扩散传播的？

### 两千多年历史的不断演化

“铜鼓云屯，欣赏了，壮家文化。中心处，一轮皎日，光芒四射。肖像周天辰十二，云波层迭纹多寡。边缘上，成对伏青蛙，服牛马。径寻丈，壮而大；径咫尺，精而雅。也并非一律千篇如卦，东汉马援曾见此，道光年号界其下，细思量，当是盖窖藏，鼓非也。”

1963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南宁参观广西博物馆的铜鼓展览后，惊叹于铜鼓形态各异、制造精美的艺术风格，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满江红》。

正史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源自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缜的《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鼓，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最珍贵的出土文物是5件铜鼓，经“碳14”测定，这些铜鼓所在的墓葬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意味着春秋战国时代，最早的铜鼓已经出现。

“这就确定了云南楚雄是铜鼓的发源地，为铜鼓起源地的争论落了结论。”蒋廷瑜说。

蒋廷瑜师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他回忆起与铜鼓初次“见面”的经历：1962年1月，苏秉琦带着学生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陈列部分，蒋廷瑜第一次见到了铜鼓，而那面铜鼓正好是广西岑溪出土，这让他感到亲切，也因此与铜鼓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铜鼓30多年，蒋廷瑜主编或参与编写的铜鼓研究著作就超过20本。

“铜鼓最初是用来煮饭的锅。”蒋廷瑜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化而来。釜主要用于煮饭烧菜，古人饭后把它翻过来敲击，以获取具有一定音乐效果的声响。随着时间的转移，铜釜逐渐演变成专用的打击乐器。“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底部有火烧的痕迹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铜鼓如何从云南传到范围如此广大的地区？蒋廷瑜认为，铜鼓主要是沿着河流进行传播。

在地理上，贯穿广西全境的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的马雄山，在广西境内有众多支流。红水河最大的支流北盘江则流经云南和贵州，贵州境内的支流还有桑郎河、蒙江等。红水河下游是柳江—黔江—浔江—西江，最后经珠江汇入大海。铜鼓的发源地云南楚雄万家坝位于龙川江支流青龙西岸，龙川江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这些河流的分布，与铜鼓在全国只有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9个省份出现相符。

在广西左江两百多公里沿岸的部分岩壁上，目前发现了60余处大型壁画。据考证，这些壁画是两千多年前生息繁衍于此的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留下的。最著名的是广西南明县的花山岩画。其断崖高270余米，南北长350余米，所画图像有1300多个，画中有人、船、马以及铜鼓等形象。这些岩画很可能记录了古代击铜鼓赛江神的活动。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铜鼓的造型、形态、纹饰等不断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逐渐由煮饭铜釜、击打乐器，发展成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最后为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所独有，变成礼器和祭祀对象。

“铜鼓虽然发源于云南，但却是在广西得到了发展和兴盛。”蒋廷瑜说，无论从铜鼓发现的数量、铜鼓的分布范围、民间的收藏力度、现在使用铜鼓的频率、资料的丰富性等，广西无疑是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 失传的工艺和千年铜鼓的“新生”

“美国、日本、英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都有人在做铜鼓研究。中国铜鼓研究有些后劲不足，年轻人对研究铜鼓兴趣不是很大。”蒋廷瑜对此颇有忧虑，曾经广泛流行于全国多省份的铜鼓，如今只有在广西的桂西北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仍在在使用。

学界对铜鼓的研究，国内外起步早，真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铜鼓的是奥地利学者弗朗西·黑格罗。19世纪末，他在汉学家夏德的帮助下，研究中文古籍，结合维也纳博物馆收藏的铜鼓和资料完成了著作《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在越南，也早有铜鼓研究，甚至和中国颇有渊源。在日本，铜鼓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蒋廷瑜说，1995年应邀在日本考察时，就在东京大学见到铜鼓收藏。日本东京东南亚学会还曾举办“考古学与铜鼓研究”会议和“地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分会。一个没有铜鼓流传，民间也没有使用铜鼓习俗的国家却主办了铜鼓研究会议，这让蒋廷瑜颇为感慨。

在国外学者对铜鼓研究如火如荼、争论不休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才意识到对铜鼓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必要。新中国成立后，铜鼓的研究和收藏才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铜鼓在清朝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基本停止铸造了，相应地铜鼓铸造技艺也慢慢失传。”蒋廷瑜说，铸造铜鼓的工艺，至今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铸造铜鼓的遗址尚在，但却未留下任何铸造模具。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炼钢铁，一些传世铜鼓遭到毁坏或破坏，铜鼓数量急剧下降，加上制造工艺的失传，让这个少数民族文化“活化石”面临很大危机。

2006年5月，壮族铜鼓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壮族的“青蛙节”、南丹白裤瑶的“铜鼓舞”、布依族的“铜鼓十二调”等与铜鼓有关的习俗和节日，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民间铜鼓爱好者的反复试验之下，铜鼓铸造又迎来了“新生”。如今在广西的东兰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都出现了制造铜鼓的工厂。

“现在我们东兰几乎每个村都有铜鼓，有时候是村民自己购买，有时候是整个村子凑钱买。”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的创办人罗明经说，近些年买铜鼓的人的越来越多。东兰、南丹等县，逢年过节或是开业庆典、红白喜事，又恢复了敲打铜鼓的习惯。“去年单是在东兰县，就卖了500套铜鼓，如果算上卖到云南、贵州的，大概有2000套。”一套铜鼓中共有4面不同音调的鼓，这是桂西北地区常用的铜鼓搭配。

“春节的时候，我这儿的铜鼓都脱销了。”另一家铜鼓厂的创办人牙运永说，原来作为礼品的铜鼓，现在大都卖给村民自用。

牙运永用12面大铜鼓现场演奏了一段乐曲，声音洪亮而激越，古代先民们敲铜鼓或欢庆起舞或祭天祈祷的场景仿佛浮现在眼前，千年鼓声在历史的时空回荡，经久不绝。



▲广西东兰县巴畴乡巴英村，少数民族同胞扛着铜鼓前去参加“蚂拐节”活动。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古镇磧口的黄河晚渡。

葛水平

那一年，站在黄河岸边的磧口古镇，低下头时，牛粪上的脚印蒙了一层粉白的细尘。正是初春，槐花开了，枣树没青，牛摇着铃铛走过。放牛的小伙子，头上有一层白霜尚未融化，紫蓝色的夹袄给人一种沧桑。

黄河流过磧口古镇。我知道春天是怎么开始的，黄河水凝聚了天空的光与色，在释放与渲染中，使初春呈现出多么蔚为壮观。

站在黄河岸边，黄色的黄河水。假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那么磧口就是黄河的童谣，就是水路长梦的驿站。

磧口，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南端，在明清至民国年间因黄河水运成为北方商贸重镇，西接陕、甘、宁、内蒙各；东连太原、京、津，为东西经济、文化枢纽，民间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之说。

磧口是水路人的托梦之处。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平静思维、流畅呼吸的地方，脚下的黄河水告诉你沧桑历史和千秋未来。历史上那些风尘千万里的远望，磧口有他们斩不断的俗缘和割裂不断的红尘。

汤汤水声，可以看出黄河岩画，正是脚下翻滚着泥汤的这条巨大的生命洪流，回旋出的呐喊形成了一种抽象，一种光芒，在天地之间的霞光蔚然里，让我们看见了生命的自然和必然。拍案叫绝的水蚀浮雕，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黄河画廊”。有专家考证说，黄河水蚀浮雕地质遗迹形成于三叠纪，也即中生代，是由地下水溶蚀与河流冲蚀作用复合于三叠系厚层砂岩而形成的天然崖壁浮雕。当然浮雕的形成还有风蚀与光照的重要作用。

磧口一带的厚层砂岩内含有大量的正长石和石英石，在水溶蚀、河流冲蚀、风蚀和日照条件下，正长石逐渐分化分解，包含在正长石之间的石英石失去了周围的支撑也从厚层砂岩中脱落下来，因此在砂岩中就形成了石沟、石瓮、石窟、石书等形状的天然画作。

当我们把这些美好归于生命的自然、必然时，蓦然想到了道论：生命本无常，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只是时间的一个点，疼痛自灵魂而生。

相互的细柳、蒲苇和杂草或枯或荣地相互覆盖。黄河，有一股渺远的寒意。麻雀在树丛乱振，夕阳悠悠垂地，最后的晚夕映得天边一片火烧，夕阳中的黄河水也渐次模糊，而另一种精神之途的苍茫也流溢在每个人的目光中。

“磧”，是地形上河石成滩之处。因湫水河在每年雨季时都会夹带大量沙石冲入黄河，强大的洪流将原本500米宽的黄河河道冲击得仅剩百米左右。河石加上激流，逼得从上游过来的船只，必须在此弃舟改走陆路，日子一久，逐渐形成一个南北货运的重要集散中心和商贸交易的休憩地。

我始终坚持人类需要面对一条大河。只有了解了人类停歇下的环境，才能真正认识人类本身。黄河，整个流域所伸张的根根根系，在流过北方广阔的疆土时，也贯通了民族生长的血脉和思想的品质。

磧口，在河岸上沿山势扭曲延伸。向上可连接到镇中心 and 卧虎山最高点的黑龙庙，向下则顺着河道北拐，接到以前的码头。几条坡度更大的青石巷弄顺着山坡与主街垂直相交，下通河道上达山壁。巷弄两旁是石垒的高墙，从墙下的洞门拐出去，不是接到一条小巷，就是走进了另一户人家。

此时，黄河水和四野的鸟鸣声融入了巨大的静虚之中，黑夜将临。河道上的喇叭声，悠长，拙朴，他的生命返回初衷，它在河道里环绕，它向大地弥散。

再来磧口古镇，已是2019年5月，黄河水依旧。一只黑鸟把远方推向更远，

## 黄河流过磧口

走在磧口古镇的街道上，河道里的风音乐一样拍打着行人的肩膀，几条巷子再次把我送往高处。黄河水长流，顶着扑打脸的尘土，看那些黄河水的皱纹吹到磧口人的脸上，在此，我认识了一个守着黄河生活的手艺人张旭峰。

他的“黄土工作坊”就开在明柱厦檐的高台台上，后院是窑洞，窑楼上的窗户前就是黄河。曾经的建筑可能是麻油行、粮商、酒行和拖载货物的骆驼店等，有大空间需求的院落，家底看上去十分深厚。

磧口是张旭峰的故事。他是一个浪迹归来的人，怀着积郁和挂念，向黄河水讨取的出生地投奔。他还记得老师说过的一句话：“黄河水把劳作与汗水粘连在榧干上，把恩情和道义衍生为村庄。”

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抛弃了故乡，故乡的寂寞和惶惑，静静地道路上突然清静下来

时，他的追寻和逃离成为一种隐痛，黄河岸上的狗吠和鸡鸣，金色的黄河水与壮阔的秋风，才是他的栖息地。

有多少人离开故乡在城市奔走？最好的姿态是丢损一些感情的记忆，失去一些善良，坚固一些谎言，秉承一些麻木不仁。不是不能，而是孤独。黄河，四浪奔腾的黄河，常常在回望故乡时思索生命，其最终是或只能是什么？

家因，来自林立高楼下的另类手工艺人的思索，人，并不是不能转承别样的文化，而是转变过程中很难承受的孤独、沉重、疼痛。只要听见有人说黄河，情感就会猛烈地滚过大地，猛烈地滚过他内心的战栗，而黄河岸上的磧口，正是他难以言说的寓言。

回到磧口的张旭峰创立了一个手工坊，做一些木梳、石雕等手工艺以维持生计。他租下的这处老宅，布满灰尘，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他悉心雕刻感受木和石的魅力，感受它们独特的面孔，感受工具与材料相互抵抗、妥协的过程。

他的八哥鸟在窑楼上飞着，它们是自由的；他的鹅在磧口古镇的街道上散步，它们是自由的；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磧口乡亲，他们是自由的。从童年开始就构筑了他内心荒凉荒漠的气质，在这里诞生，也必将在这里终老。从早上看见黄河水涌流时，看见老的心便澄明如镜。时间的积累混着自己的体温让这古老的技艺更加弥足珍贵，这些大概也就是张旭峰重返故乡生活的意义吧！

黄河边的磧口古镇，每年都有很多知名画家和美术学院学生慕名而来写生。手工坊生意不忙时，他就会去看他们画画，他将生活、自然、灵魂放在同一节奏中，作画时取材多半于天然，用诗性的思维将黄土高原粗犷而质朴的气质跃然纸上。

他说：“我的作品需要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一起感受才完整。这是孕育我所有艺术细胞的根源，如果割裂了与这种文化精神的联结，便无从体会作品中的原汁原味。”

人哪，就是这样，最不能有贰的是心。在他的炕头上我坐到明月当空，聆听另外一个叫曹对龙的年轻人讲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八十岁时跳入黄河。任何河流都会剥夺入水人的衣物，黄河不。黄河呵护人，凡是落水人的衣物全都在身体上裹着，如生前一样。就因为小时候他落过一次水，黄河发大水，有一个漩涡漩过来，他觉得好玩跳了进去，他的祖母意识到是黄河河神收人了，她认为她若不死她的子孙就要遭殃。绝望的爱的执着让她心中沉睡的东西醒来。当她从磧口古镇走向黄河岸边时，她感受到了生的卑微和死的庄严，而只有死亡才可以接近生生不息。

夜晚的磧口变得幽深、深厚、醇和、沧桑，黄河水含着朦胧的星光，如时光的投影，夜把远方推向更远，明月把一切罩在其中。

磧口古镇，我如此喜欢它，如同喜欢我的故乡，如此，我想到了：故乡的明月也可以照亮我的前程。